

## 简论辛弃疾词的军事文学特征和意义

祝振玉

辛弃疾生平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为南宋一代英豪。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更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他早年在北地鸠众聚义,杀贼擒叛,英武过人。南归后锐意抗金,上《美芹十论》、《九议》等奏札,条陈战守之策,足显其深谋远虑的军事韬略。在被委以方岳军政大任期间,又经常整顿武备,思报寇仇,以上事迹见于本传史籍他人题跋,斑斑可考,不遑详述。笔者所要探讨的是他的英雄豪杰的军人才调在词中的表现,阐述辛词的军事文学的特征。庶几能开拓辛词研究的疆域,从新的文学角度进一步认识辛词的价值与意义。

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称辛词“大声鞞鼙,小声铎钲,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sup>①</sup>可见,辛弃疾的作品决非是当时那些搔首傅粉吟风弄月的词客所能比拟的。而稼轩对于传统词坛的变革振新开创,恐怕就在于他以沉雄豪俊的军人才调,将尚武精神、兵战意识、英雄主义充实于丝竹管弦,打破风月情浓的一统天下,以勃郁壮烈的军事文学特色,赋予宋词以崭新的时代意义。

辛弃疾在他的《美芹十论》、《九议》中已经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文学风范,人称其“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论衡》之风。”(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但稼轩的军人本色,更体现在他的歌词创作中。辛词中洋溢着尚武的精神,不乏对战争场面的精彩描绘,他呼唤历史英雄,并自许自期,表示对建立军功,恢复失地的渴望。由于南宋小朝廷无意于抗金复国,致使他韬略雄才皆付之东流,由此又使他的作品充满英雄失路的感慨与悲愤。辛词的一些代表作,总是与军事和武功有不解之缘,表现出一个雄杰奋发的军事家与当时的软弱腐败的社会政治的矛盾。由此而产生的痛苦与压抑的心态构成了辛词特有的基调。

“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正是作者年轻时在兵车羽檄,戎马倥偬中的写照。联系他在 23 岁“时赤手领 50 骑,缚取(叛徒张安国)于 50 万众中,如挟纆,束手衔枚,由关西奏淮,至昼夜不粒食”(洪迈《稼轩记》)的勇武,辛弃疾在词中表现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自豪。他在《念奴娇·重九席上》亦写道:“重阳佳节,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可见他一生始终以军人自命。在另一些歌颂历史人物的篇章中,也往往折映出他豪俊的英姿。从“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阮郎归》)的倜傥,“季子正年少,匹马黑

<sup>①</sup>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

貂裘”(《水调歌头》)的英武,以及“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雄霸,描写的虽是历史人物周瑜、苏秦(季子)、孙权,但无疑透露出作者尚武俊杰的本色。从辛弃疾的诗文歌词看,他无疑具备学富五车的文才,但他丝毫没有通常的文人那种恭谦晏如的气象,豪俊中带些微的霸气,正是稼轩翁的气质。他出生于尚武风气很盛的齐鲁故地。山东济南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西部领地,齐桓公时创霸诸侯,军事学亦特别发达,中国最早的兵书,传为姜尚所著的《六韬》以及《孙子兵法》都出自齐。战国时又有稷下之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大盛于齐。历史文化的渊源,固与他的尚武精神不无关系,但决定他弃文就武,投笔从戎<sup>①</sup>的关键,乃在于他抗金复国的爱国精神。他认为只有“平戎万里”<sup>②</sup>才是一个真正儒者的功名事业。所以,稼轩的豪俊尚武,决不是一个马上英雄的自诩,而是包含着强烈的爱国内容的。他的一首《西江月》可说是这二者结合的完美体现:“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人和,燕可伐与曰可。此日楼台鼎盛,他时剑履山河。都人齐和《大风歌》,管领群臣米贺。”<sup>③</sup>从而表现出作者和当时某些空喊恢复侈谈名节的读书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与事业观。

与他的尚武精神相关联的,是他在词中对于战争军事场面的精彩描写,这在宋词中是别树一帜的。由于他早年的军旅生活经历与尚武的气质,使他对战争题材的描绘显得驾轻就熟:“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扬济翁、周显先韵》)这是两军对峙的壮观场面。“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破阵子·为陈同甫壮词以寄》)这是回忆中的阅兵式。“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鹧鸪啼。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满江红·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这是大军出征告捷的威仪。对于战争激烈场面的描绘,最著名的要推辛弃疾的《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其中的“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裘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胡骑,汉箭朝飞金仆姑。”可说是宋词中描写战争最杰出的篇章。前人作品中,不乏对边箭胡马、吹猎征战的描绘,如《敦煌曲子词》中的“落雁一张弓,百支金花箭”(《生查子》),贺铸“闲呼鹰犬,白羽摘雕弓”(《六州歌头》),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描写的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演习,“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表现的是太守出猎的声势,但吹猎的目的是“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李纲的《喜迁莺·真宗幸澶渊》对宋真宗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一次“御驾亲征”也有过出色的描绘:“日照金戈,云随黄纛,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敌首难保”。但是,这些篇章比起辛弃疾的一些名作来,对于军队生活战争场面的描绘,就显得笼统与简略,不及稼轩的生动传神,精细在行。特别是《鹧鸪天》中“燕兵夜娖”两句,写了自己早年戎马渡江与金兵日夜激战的情景,真是点画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可以说有关战争场面的描写,在宋词中无出其右者。这也是作者早年英武气概、赫赫战功的真实写照,是非亲历其境,亲与其事者不能道的。对于军事生活战争场面的精彩描绘,无疑说明了作者对军旅生涯的热爱与向往。这和他爱国尚武的精神是一致的。

缅怀歌颂历史上的军事英雄,也是辛词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本人是文武兼备的英雄,所以他热爱、推崇英雄。他认为“天下有英雄者出,然后能屈群策而用,有豪杰者出,然后能知天下之情。”(《九议》)可以说,在宋代词人当中,没有哪个作家的笔下曾出现过有像辛弃疾词中提到的

① 辛弃疾《稼轩先生年谱》:“先生十四领乡举。”

② 见稼轩《水龙吟·申辰寿韩南涧尚书》

③ 此词见稼轩词四卷本丁集。

那么多的将帅王霸。这当中有战国名将廉颇,还有“剑指三秦,一战东归”的刘邦,以及鏖战赤壁的曹操、刘备,坐断东南的孙权,更有汉代飞将李广,击楫中流的刘琨,闻鸡起舞的祖逖,马革裹尸的马援,虎步中原、横扫河洛的刘裕,还有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的张良、韩信、诸葛亮等等。以上各路王霸英雄,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在军事上有所建树,为安邦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但是,稼轩最景仰心折的是那些依托东南,北伐中原,讨平匈奴的英豪。他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称扬了“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认为他凭借长江之地理形胜,覬觐中原,与曹操、刘备抗衡,不失为一代英杰,所以在词末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誉。另一位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稼轩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描绘了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雄风。刘裕崛起孤寒,曾凭借京口两度挥师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故土。再一位是汉代的飞将军李广,他在《满江红》(汉水东流)《卜算子》(千古李将军)《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等词中,多次提到李广射虎南山,大败匈奴的英姿伟绩。在这些历史英雄人物中,寄托着作者对现实的渴望,那就是锐意北伐,收复失地,将女真统治者赶出故土。因此辛弃疾缅怀称颂历史上的将帅王霸,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表达自己追踪前人、抗金复国的爱国志向。辛弃疾对历史上军事英雄的呼唤,也包含着作者“千古江山,英雄无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失落与孤独。稼轩是一个英雄人格意识极强的人。他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前代英豪的遗踪,更是自许自期。但是他生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的南宋苟安社会中,具有雄才大略、抱负非凡的稼轩确实会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苦闷与悲哀。“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水龙吟》)引用的虽是晋代童谣“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的典故,但实际是指讽南渡朝廷的无能。我们可以发现,辛弃疾在词中提到的英杰雄才,无一不是唐以后的人。这其中固有其自视甚高的一面,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辛弃疾追怀历史上的军事英雄,也并不全是厚古薄今,目空当时,而是寄寓着作者对南宋抗金大计缺乏股肱之才的失望和忧虑。

这种英雄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辛词中有充分的体现。他不仅自许自期,与历史上英雄人物相比,因袭着时代的重负,坚持抗战复国的主张,还总是用歌词来激励其他爱国同仁,以恢复之事相勉。“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他认为只有军事的神剑才能驱散西北侵略者的妖气。他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以战死沙场为自己的理想归宿。念念不忘“袖里珍奇光五声,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即使在垂暮之年,仍壮心不已,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表示对中原陆沉的忧虑关切。这种爱国军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也会辐射到他平日与人酬唱往还的社会生活中。辛词中有许多是写给朋友的礼仪之作,但却没有流于应景承讷的俗套。而同样倾泻出他胸中的一腔英气。而以抗金复国的大任相期,清人黄蓼园论稼轩的《水龙吟·寿韩南涧尚书·甲辰岁》说“幼安忠义之气,由山东间道归来,见有同心者,即鼓其义勇,所以颂美,实句句是规劝,岂可以寻常寿词例之。”(《蓼园词选》)辛词中这类作品不少,此说实可隅反。

辛弃疾在词中表达得最多的,也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一种英雄寂寞的叹息,壮士失意的牢骚,将军赋闲的愤懑,以及一个爱国者对南宋命运的焦灼与忧虑。“弹短铗,青蛇三尺,浩歌谁续。”(《满江红》)“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严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韵,因再和之》)“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剑,是武士的信物,军人的标志,辛弃疾十年磨剑,枕戈待旦,志在报国,但朝政昏聩,请缨无路,不禁抗高调,转悲凉。“莫说弓刀事业,依然诗酒功名。”(《破阵子·峡石道中有怀吴子

似县尉)“莫邪三尺照人寒,试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作琴伴,未须携去斩楼兰。”(《送剑与傅岩叟》)在这些军人的牢骚后面,是作者深深的失望与悲凉。当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时候,其心情亦正如黄蓼园所评:“稼轩忠义之气,当高宗初南渡,由山东间道奔行在,蝼蛄间关,力图恢复,岂是安于退闲者。自秦桧柄用,而正人气沮矣。所谓惊弦骇浪,迫于不得已而思退,其心亦苦矣。”(《蓼园词选》)然而,辛词之可贵之处,乃在于其充分展示自己的牢骚、愤懑、失望、悲凉等种种矛盾痛苦后,又最终以眷恋家国,矢志恢复为主旋律:“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用前韵赠金华杜仲高》)“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终于完成他作为一个爱国将领杰出词人的伟大人格。谢枋得说辛弃疾“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浚),岳武穆(飞)之下。”<sup>①</sup>洵非溢美之词。

## 二

辛弃疾一生是很不得志的,他具有出将入相的雄才大略,但生活在南宋这块投降派当政的土地上,致使辛弃疾一生的壮志未酬,在英雄寂寞闲处老之际,辛弃疾以自己烈日秋霜般的忠肝义胆,与其激越奋发的军人气质相摩挲激荡,将有心报国,无路请缨的一腔勃郁不平之气,皆托之于歌词陶写。从而使他的作品完全突破了传统词家香软柔媚的风味,显示出豪俊壮烈的军事文学特色。

辛弃疾的词充分表现了一个锐意进取,满怀爱国热忱的军事英雄,同腐败软弱的政治现实的矛盾。从事业与感情来说,他展示的是自己一生的不幸与悲剧;然而从文学创作的成就来看,他又是一个有建树的成功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所谓“变调”和“别立一宗”,指的就是他迥异常流的沉雄激越的艺术风格,而造就这种艺术风格的精神核心,便是作者本人军事英雄的才调与尚武寇仇的兵魂。清人陈廷焯曾批评“稼轩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等作,不免剑拔弩张。”(《白雨斋词话》卷一)此正道出了辛词文学的特征。不过他又说:“稼轩最不工绮语。”“稼轩词仿佛魏武(曹操)诗,自是大本领,大作用人语。”(同上)又颇具慧眼。曹操横槊赋诗,多为鞍马之作。敖器之论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诗评》)以此来看稼轩词,不无仿佛之处。也有人称“稼轩仙才,亦霸才也。”(江顺诒《词学集成》附录)所谓“霸才”,亦实就他睥睨一世,威武凛然的军人才调而言,这正是稼轩词风格的精髓。文学史上以“苏、辛”并称,其实二人有不小差异,其水分岭就是文武之别,两人阅历气质不同造成创作风格的互异前人早有论例,如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周济云:“稼轩不平则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间语;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由此看来辛弃疾在歌词创作上的建树,正是以他征战叱咤的金石之声,压倒了传统词家风月情浓的靡靡之音,不仅为抗金将士在词中争得一席之地,也奠定了自己歌词创作的杰出个性与时代特色。

如果说,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九议》中表现的是一个军事家对敌我虚实、战和之策冷静的理性探讨,那么辛词中的一些名篇则是通过沈郁悲壮低回激越的歌吟来抒发自己正义的战

<sup>①</sup> 谢枋得《叠山先生文集》卷七《祭辛弃疾先生墓记》。

争意识与英雄的情怀。

由于北宋文恬武嬉,南渡后又兵魂销损,文学作品中虽然有爱国志士的击筑悲歌,但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不恤国事的闲情逸志仍是文学作品的基调,而在词这块传统的风月情浓的芳草地里,军旅之音,征战之声更被视为异端与别调。在后来传统词家的眼光里,苏轼为“衣冠伟人”,而稼轩则是“弓刀游侠”。(见谭献《复堂词话》)陈模《怀古录》卷中谓:“近时作词者只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稼轩词为豪迈,非词家本色。”陈廷焯曾批评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瑞鹤仙·南涧双溪楼》等名作“才气虽雄,不免粗鲁。”(见《白雨斋词话》卷一)这些雌声学语斤斤株守的传统词家的訾议,正也说明稼轩雄杰横放的军人才调是软媚绵丽的词家绳墨所难以束缚的。辛词是英雄的咏叹,将军的悲吟,“今乃欲与搔头傅粉者比,是岂知稼轩者。”(徐钊《词苑丛谈》卷四引梨庄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词是军人的文学。

辛弃疾虽然没有像陆游那样,集中十九是从军乐(这是梁任公诗化的称赞),但辛词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特别是一些名篇与抗金复国的军事大业密切相关,这在前一章中已有引用,不再赘列。辛词的一些篇章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爱国军人的情怀心态精神面貌,使一个壮怀激烈,慷慨悲壮的豪杰形象跃然纸上。在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辛弃疾一生的军旅生涯,感受到他的气质个性,思想志趣。这其中既有他早年气势豪迈,虎啸风生的生活写照,也有中年后抚今思昔将军寂寞的悲慨,更有晚年英雄垂暮回首平生的失望。围绕弓刀事业恢复宏图,稼轩在词中所表现的是作为一个爱国将领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在宋词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在稼轩之前宋词所展现的生活场景,社会氛围,往往是闺阁轩栏,灞桥杨柳,抑或是山水亭驿,古迹遗踪,而很少见到沙场战争的场面。北宋的刘潜、苏轼和南渡初的李纲虽有描写沙场战争情景的句子,但因为不足名篇往往被人忽略不计。而辛弃疾却在词的天地里,开辟出一个有声有色的壮阔雄伟的战争场面,如前一章所引到的《破阵子》(梦回吹角连营)、《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等篇章。稼轩对于沙场征战景象的精彩描写在他的全部词作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却使那些红粉佳人傅粉弄姿的传统风月画卷顿时相形失色,它让词的世界也接受现实生活的血与火的洗礼,稼轩在刀光剑影中谱就一曲从军乐,从而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词的疆域。

作为军人的文学,辛词还丰富了词的艺术风格,提高了词的品位。词至于南宋,以风情婉变为正宗,然一味发展下去,必导致萎靡不振而使人生厌。故后来杨慎说:“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词品》卷四)谢庄铤曾批评南宋词人“在花柳而无松柏,有山水而无边塞,有笙笛而无钟鼓,斤斤株守,是亦只得其一偏矣”。所以他认为“辛、刘(庄克)一派,安可废哉”。(《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南宋传统婉约词品位不高已为后人所共识,那么,辛词以其阳刚之气,钟鼓之声补偏救弊,大大提高了宋词的艺术价值思想境界,这对于那些轻薄为词晒未休的倚声家来说,其意义真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了。

### 三

如果我们把辛词中那些悲壮昂奋的篇章放到南宋整个文学与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会发现,稼轩在歌词中所抒发的军人情怀,英雄心志,豪杰气概,其意义不止是促进词体解放,开拓词境,提高词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弘扬、深化了中国的军事文学。它通过发扬兵魂,振

作人心而在当时具有挽救士气鼓舞斗志的社会效果。

中国自古有军事文学的传统,从有战争起就和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上古时期失之洪荒,春秋战国时代早已载之篇章。《诗·秦风·无衣》的“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表现了先民共赴沙场的慷慨。楚辞中的《国殇》是一篇有关战争的写实作品,但同时宣扬了将士为国捐躯的崇高:“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强化了人们舍身取义的心理。如果说汉乐府《战城南》是一首诅咒战争哀悼阵亡士卒的悲歌,那么曹操的《蒿里行》同样是一篇感叹战争苦难的名作。这种对战争的悲剧心理在唐代这个开疆成边邀取功名的社会中有改观。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始至塞上》)边陲风光到“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这种雄浑的气势与高昂的情调压倒了以往人们对战争残酷的具体刻画。

然而在宋人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如此邀取边功以求仕进的激昂插曲。由于宋人在军事上仅谋雪耻只求恢复而不是建功拓边,所以宋人(特别是南宋)的一些有关军事文学的篇章,只是抒发一种充满强烈民族感情的属于报仇雪耻的战争愿望,而辛词正是如此。由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施展的机会,他对于正义战争的向往只能通过回忆、梦境、酬赠他人之作中表现出来。所以辛词的一些篇章主要是表达了他对抗金的正义战争的感情与态度,而不是对实境的描写。

辛弃疾在词中所表现的军人才调,又具有浓厚的悲剧性。因为他的一些代表作,深入曲折地表现了自己从军人到文人,从壮士到赋闲,种种复杂矛盾而又痛苦悲壮的感情,它反映着当时人民正义战争的愿望被压抑,民族感情遭到损害时的普遍心态。这在汉唐时期是没有的,这也可以说是南渡后一些爱国主义篇章共同的基本特征。

由于辛词充满强烈的民族感情,表达的是对正义战争的意识与理想,所以尽管辛词所抒发的感情是悲壮的,但它对于战争场面的描绘,并没有古来征战几人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凄凉,而是激昂慷慨,充满建立在爱国精神基础上的英雄主义。这种悲剧的英雄人格精神,同样是汉唐的军事文学中不多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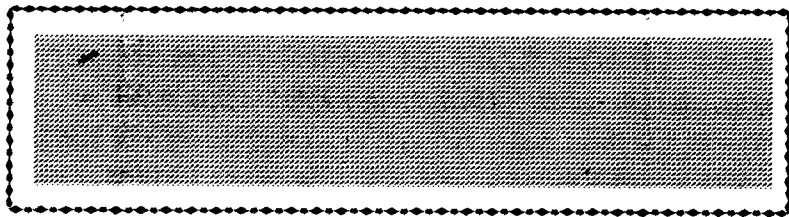
辛词对于中国军事文学的弘扬与深化,还在于他擅长运用词这个音乐文学的形式,使传统的军事文学更加感发人心,并给人以新鲜昂扬的美享受。词以其长短参差,抑扬顿挫的句式音节,低回要眇盘旋吞吐的规程风范,具有五七言诗所没有的美感特征。梁启超曾评论稼轩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以为“回肠荡气,至于此极”)(《饮冰室评词》)。其实何止是一首《摸鱼儿》,稼轩的一些代表作如《永遇乐》(千古江山)、《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等无不是潜气内转,铿锵跌宕,他使传统的军事文学得到艺术的升华,通过“大声鞞鞞,小声铿鞞”的声律节奏,赋予军事文学以音乐的美感。

在南宋这个苟延残喘风雨飘摇的社会里,辛弃疾在词中弘扬兵魂,宣扬正义的战争意识,其意义又岂止于在文学上的建树。我们知道,宋代是个“郁郁乎文”的朝代,以文立国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的基本国策。北宋取仕,虽有武举之目,但文人耻言兵事,却为一时习尚。这种风气实源于唐季,杜牧《孙子兵法注》曾讲到当时“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倘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这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皆尽力于经史词章之学以致崇文抑武大有关系,至宋代这种风尚更为变本加厉,在当时花光照席,红袖伴舞的享乐生活里,整个社会不仅陋言兵,且不知兵戈为何事。晁公武说:“仁朝时,天下承平,人不习兵。”(《郡斋读书志·王皙注孙子三卷提要》)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也谈到“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王文公文集》卷一)陈师道甚至视兵家之书为异端,上书说“孙、吴之书,盗术也,不陈于王者之前。”认为兵事“非圣人之学”,要朝廷“却兵家之图书。”(《后山先生集·拟御试武举策》)在北宋末年畸形的和平环境,

人们根本就没有战争意识和动乱的心理准备。李靓《感事》诗对此深有感触：“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sup>①</sup>南渡后无名氏之《水调歌头》亦引以为沉痛的教训：“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sup>②</sup>武备的松懈应归于朝野的耻言兵事，它导致金兵乘虚南侵以致丢失了赵宋的半壁山河。

靖康之难后，文人士大夫沉歌酣舞的生活虽然为烽火血影所惊醒，但短暂的激愤不久又消失在和议投降的妖氛里，畏疲隳颓的风气又充溢于南宋朝野。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谈到：“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虏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虏。秦桧倡邪义以阻之，忠仁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为何事也。”<sup>③</sup>北宋的覆灭在于武备松懈，南宋的被动挨打又在于苟安投降。两代统治者的共同特点是厌兵惧战，“兵魂销尽国魂空。”南渡后的情况正如黄 在给辛弃疾的信中所说：“江左人物，素号怯懦，秦氏和议又从而销靡之，士大夫自是奄奄然不复有生气矣。”<sup>④</sup>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稼轩以歌词为陶写，将尚武精神，兵战意识，英雄主义充实于诗坛词苑，其意义又岂止于文学而已。辛弃疾给南宋社会带来了中原豪杰尚武寇仇的兵魂，正如赵文在《吴山房乐府序》中所说南宋“渡江后康伯可（与之）未离宣和间一种风气，君子以是知宋之不能复中原也。近世辛幼安跌宕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所谓豪杰之气，正是稼轩在词中所弘扬的爱国主义的军人才调。这正是南宋朝廷特别缺乏且应视为立国之本的。但是赵宋王朝卑躬屈膝的苟活方针，至使南宋士风日趋萎弱。所以，稼轩以歌词振顽起懦，强化人民的兵战意识、宣扬尚武的精神，引起刘克庄、陈亮、刘过等人的相和鼓吹，这在当时无疑具有感召人心，挽救士风，鼓舞抗敌斗志的社会效果。<sup>⑤</sup>



① 李靓《李直讲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② 转引自曾敏行《独醒杂志》

③ 陈亮《龙川文集》卷一

④ 黄 翰《勉斋集》卷一《与辛稼轩待郎书》

⑤ 以上所引辛弃疾诗、词，如不另标出处，皆引自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辛弃疾诗文集》。

所引有稼轩生平事迹，参考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年谱》，齐鲁书社。有关词论引自唐圭璋辑《词话丛编》。